



论韩愈干谒书信的自我书写

The Self-expression of Han Yu's Self-recommendation Letters

戴佳恩

TAI JIA EN

21ALB02371

指导老师：余曆雄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FEBRUARY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2025 Tai Jia E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
第四节 研究难题.....	7
第二章 韩愈与其干谒书信.....	8
第一节 韩愈家庭背景与其求仕思想.....	8
第二节 韩愈仕途经历与干谒书信创作.....	11
第三章 韩愈干谒书信之自我书写.....	13
第一节 复古求奇.....	14
第二节 人微贫苦.....	19
第四章 韩愈干谒书信之心态变化.....	21
第一节 自我形象之对比.....	22
第二节 干谒行为之定位.....	25
第五章 结语.....	31

引用书目.....	33
-----------	----

附录.....	36
---------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戴佳恩 TAI JIA EN

学号：21ALB02371

日期：2025 年 5 月 2 日

摘要

干谒书信不仅反映了干谒者对进入仕途的渴望，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荐举制度与士人求仕的困境。本文使用了文本分析、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与历史批评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韩愈 11 篇干谒书信，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再将其与韩愈其他作品进行对比，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深入剖析韩愈干谒书信中“复古求奇”与“人微贫苦”的自我形象建构。接着，结合韩愈的其他作品与事迹来探讨他在不同阶段对干谒行为的心态演变。韩愈在书信中塑造出复古、求奇的形象，也描写自身生活之困顿，希望获得干谒对象的关注与同情，进而被举荐和提拔。韩愈对干谒行为的态度也历经转变，从最初的排斥、羞愧到逐渐接受，并最终肯定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甚至鼓励后进之士行干谒以施展才能。学界关于韩愈干谒书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心态转变，关于研究自我书写的研究较少。本文探讨了韩愈生平、求仕思想之形成与其干谒书信创作背景，再分析信中的自我书写，后再进一步对比分析信中所体现的对干谒之看法，系统性地对韩愈干谒书信的自我书写与干谒心态进行研究。

【关键词】 韩愈、干谒、求仕、干谒书信、自我书写

致谢

行文至此，回顾行迹，只剩满腔感激。感谢所有的相遇、相识、相知。感谢所有的老师、学长姐、朋友们。感谢余曆雄老师的指引，让我在迷茫时寻得前行的方向。

第一章 绪言

韩愈（768-824），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故后人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散文家，推动了古文之发展，也为后世留下许多珍贵的文学遗产。韩愈现存的作品有近 400 篇散文，可分为表、状、书、启、序、记、传、说、赞、颂、赋、策、论、史论、哀辞、祭文、杂文、碑铭、墓志铭等各个文体。各个文体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师说》《马说》等作品更是千古名篇，当中的思想流传千年，世代品读，影响深远。其中，“书”指书信体，其具有实用性，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媒介。本论文将针对韩愈散文中的书信这一文体展开讨论。

韩愈一生在宦海沉浮，早年时苦考科举一心求官以报家国。他在求仕阶段写了多封干谒书信，如著名的《上宰相书》，以求被举荐，求得一官职。韩愈有近 60 篇的书信作品，其中 11 篇为干谒书信。苏轼曾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¹从文学和政治方面肯定韩愈的能力与人格，此亦说明韩愈的成就极高。是以，本论文将以韩愈干谒书信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干谒风气、韩愈思想、文风等方面的关联。

¹ [宋] 苏轼撰、[明] 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 17，页 509。

第一节 研究动机

书信，古代也称作尺牍、书简、书札等。书信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其中一类，是人们私下互通消息、相互问候的一种形式。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是最早对中国书信发展史进行系统性整理的重要资料。刘勰梳理了书信的源流和写作特点。《文心雕龙·书记》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悖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²刘勰总结了书信的文学特征。书信这一文体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尽言”，将自身想说的话全然地表达出来，通过言语抒发内心的情绪，同时展现自身的风度、文采。此外，他认为书写书信时应该条理清晰地阐述性情志向，从容不迫地书写内心之情感、怀抱，以此将自己的心声清楚从容地进献给对方。书信具有私密的特性，相比其他作品，从中可更直观地看到作者真实、鲜明的情感和思想，是进行人物研究可采用的重要史料。是以，本论文选择以韩愈书信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在韩愈以前的书信体散文多以骈体进行写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信体散文，大都文采斐然，感情色彩浓厚，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有的书信状物绘景，读来如山水游记，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³到了唐代，唐人承六朝写作风气，延续了以骈体文创作的习惯。骈体文辞藻华丽，对偶工整，讲究用典，受时人推崇。然而，到了中唐，时人创作骈体文时过度追求形式，忽略了文章内涵，更有甚末流者为凸显自身之才，在文章中肆意用典，使文章空洞乏味，骈文弊端尤显。因此，韩愈、柳宗元等人批判骈文创作之乱象，并倡导古

² [南朝梁]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5，页933。

³ 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页196。

文运动。在这背景下，骈体文被散体文替代，要求文章内容应充实有物。古文运动也推动了书信体的发展。当时的书信或论议时政，或讨论学术，或批评诗文、或传授学业，或抒写遭际，或劝谕亲朋，一般都能做到发自肺腑，言之有物，吐露衷情。⁴韩愈的书信创作中都能看见以上这些特点。韩愈提倡以散体文创作，意在改变先前的骈文创作僵化的模式，但其并非全盘否定骈文。他认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⁵创作文章时内容与艺术手法都应兼顾，缺一不可，所以他吸取了骈文中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其散文创作中。因此，在其书信创作中，可见骈散结合的特点。这是韩愈书信与在韩愈之前的书信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

韩愈书信可根据其受书对象、书信内容、书写目的分为不同的类别，本文将主要讨论韩愈书信作品里面的干谒书信一类。干谒，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指有所企图或要求而求见显达的人⁶。“干”有求得之意，如《论语·为政》中“子张学干禄”⁷；“谒”有拜见之意，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中“上至，相国谒”⁸。二字组合使用，便是有所请求而拜见之含义。干谒行为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因“士”的兴起和其政治活动而出现。到了唐代，因取士制度逐渐完善，科举风气兴盛，再加上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渴求，干谒风气大盛，干谒书信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唐代举子中间盛行向达官贵戚、名士闻人投书献文章，博取他们的举荐和揄扬，以期引起主考官员的注意和赏识之风气。⁹关于这一现象，赵树功在《中国尺牍文学史》这样解读：

⁴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410。

⁵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1462。

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421。

⁷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1，页59。

⁸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卷53，页1614。

⁹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48。

干谒书的兴盛可说是唐代文人强烈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是建立功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心态、观念下的产物，更是唐人经世、出仕的手段。它披着不太光明正大的外套，却显示了大唐之际知识分子昂扬向上的进取意识。¹⁰

这个说法也适用于韩愈，诠释了其对于求官的执念。一篇篇干谒书信背后蕴含了韩愈欲建功立业之深切渴望。这样的文字虽然曾经被后人认为“略不知耻”，却是韩愈不托空言、肯说实话的文字。¹¹为得到上位者的赏识，干谒书信中的内容、自我叙述部分便至关重要。韩愈在干谒书信中如何书写自我？有何取舍？背后有何种考量？本论文将透过对韩愈干谒的书信的研究，试回答以上问题。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

学界对于韩愈散文的研究大多数都聚焦在其议论类的文章，对于其书信的研究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关于韩愈书信专题研究的论文有李娟的《韩愈书启文研究》，其将韩愈书信根据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并从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研究，进而总结出韩愈在不同书信中的心态。此文清楚整理和归纳了韩愈的书信作品，惟缺乏了新颖的独特视角。谭科的《韩愈书信研究》则以韩愈在书信中的情志表达对韩愈书信进行研究，延伸至其艺术特征。另外，此文还以韩愈书

¹⁰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页197。

¹¹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194。

信与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视角，从而探讨韩愈书信对古文运动的作用和古文运动对韩愈书信的影响，这扩展了韩愈书信研究的研究视角。

关于韩愈干谒书信的研究，论文方面有关韩愈的干谒书信内容多是出现在某一章节或是散落在全文的内容之中，如上方提及的两篇论文以及王凤玲的《唐代书信研究——以干谒、论文、论史书信为中心》和贺叶平的《中晚唐干谒散文研究》。前者在论文中以唐代干谒书信作者的身份和其内容将干谒书信进行细分，并考察总结了干谒的对象；后者则以中晚唐干谒散文的精神内涵、文风和表现艺术为研究视角，也探讨了干谒散文与士人心态和士风之间的关系。两篇论文对唐代的干谒风气和士风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对本论文相关论述有一定的帮助。

在期刊方面，则可见韩愈干谒散文的专题研究，如游胜辉的〈论韩愈干谒文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当中着重分析了韩愈干谒文中复古求奇的特异形象和啼饥道穷的困厄形象，并进一步探讨韩愈自身对于干谒行为的定位。此文的研究视角对本论文有启发性的帮助。其他有关韩愈干谒文的研究还包括李强和李霞的〈韩愈和三苏干谒书信辨异〉和由亚萍的〈韩愈的干谒书信之心路历程分析〉等期刊。前者通过对比韩愈与三苏干谒书信的内容，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不同朝代的士人心态；后者则根据创作时期将韩愈干谒书信分为六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韩愈心态进行分析。

关于唐代干谒风气和干谒书信的专书有王仝的《唐代干谒与文学》。此书梳理了唐代选士制度与干谒之风的关系，总结了唐代文人的干谒手段、特点、心态，并分析了干谒与唐代文学发展之关系，帮助读者对唐代干谒风气与其衍生文学有全面的了解。此外，赵树功的《中国尺牍文学史》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古

代书信之发展，当中的第三章第二及三节的“韩柳风气”和“干谒书”的篇幅对本论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韩愈干谒书信的研究仍有可讨论的空间。是以，本论文将以韩愈干谒书信中的自我书写为研究视角进行作品分析，并进一步对比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与事迹，分析其自我书写的真实性，以对韩愈求仕阶段的心态、思想、经历与文学作品有更深入地了解。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使用以下各类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达到所设之研究目的。

（一）文本研究法。文本研究法指通过研读、分析文本，作为论点的依据，达到研究的目的。文本是论文的材料，通过对材料的整理、分析，方能归纳出某种现象或类别。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韩愈的干谒书信。因此，本文将通过研读韩愈干谒书信并仔细分析，以梳理韩愈干谒书信中的自我书写内容并进行归纳。文本也是论证的基础，唯有文本为证，文中所提出的论点才能站稳脚跟，有理有据。

（二）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指通过查阅相关研究领域的资料如：专书、古籍、论文、期刊等文献，作为研究中的论述材料，达到研究的目的。通过翻阅不同的文献，得以对相关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对论文选题、方向、研究现状有初步的概念。同时，通过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或论点，对本文的结构和内容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他文献的补充亦使得研究的论述更为全面与充实。

（三）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指通过对比两个具有某个相同特性的人、事、物，从而比较出两者的相似或不同的特点。本文对比了韩愈不同的干谒书信中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言辞之选用、心态之变化等方面的内容。此外，本文亦将韩愈干谒书信与其同一时期所作之作品和事迹进行比较，以研究其干谒书信中所塑形象之真实性和所叙观点之准确性。

（四）历史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指将文学文本放入其历史脉络来加以探讨分析。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局影响、文化观念都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影响。文学文本可反映出当时的历史面貌。本文将结合韩愈所处之时代、唐代的科举制度、时人的求仕心态来探究其干谒书信中的自我形象之建构，并进一步思考韩愈干谒书信中关于自我书写的考量。

第四节 研究难题

目前学界关于韩愈干谒书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其书信中的心态转变，并进一步探讨韩愈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其心态转变的关联。韩愈干谒书信研究领域中少有全面地对其干谒书信进行详尽的论述与其他一些相关问题的梳理的研究成果。这对其干谒书信的整理工作与论述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另外，对于其干谒书信中的自我书写的探讨并不多，相关文献也相对来说比较少，这使得在研究时缺少学者观点的补充与参考，加大了论述难度。此外，韩愈作品数量众多，且种类繁多，这对于他的干谒书信和其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的自我形象与观点的对比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第二章 韩愈与其干谒书信

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牋钞〉序》曾云：“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牋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明的注释。”¹²当中的“尺牋”是古代书信的代称，早期人们的书信内容多写于木板或竹简，故得此名。“简明的注释”是作者自身真实的体现。书信之真实点不单指作者当下思想之反映，亦是作者所处现况之纪实记录。本章节将通过梳理韩愈之家庭背景，了解其求仕思想之形成，后再进一步通过对韩愈当时的求仕经历的梳理，了解其干谒书信之创作背景。

第一节 韩愈家庭背景与其求仕思想

韩愈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其高祖父至其父世代都曾当过朝廷官或地方官。韩愈父亲仲卿在世时当过县令。其兄韩会，叔父云卿曾收到李华、萧颖士的影响，支持古文运动，且颇有文名。受家庭影响，韩愈自小便精进读书，还立下志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¹³。

¹²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429。

¹³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455。

韩愈三岁丧父，年幼的他便与兄嫂一家一同生活。兄长韩会对政治有所抱负，早期未仕前就已积极参预政治，关心政局，更因其斐然之文采在当时已颇具盛名。后来，在大历后期韩会受到宰相元载之赏识，获任起居舍人，如愿入朝当官。然，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¹⁴，于大历十二年（777）被捕赐死。韩会也受此事影响，加上自身“善清言”之特质，遭人所妒，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韩会一家远赴韶州，韩会因被贬心情忧郁，加上赴任途中饱受艰辛而身患重病，在大历十四年（779）便去世了。另外，韩会善于文章，韩愈在韩会的辅导下学习读文。韩会对韩愈产生正面之影响，其文章之创作、其人之品德、以及其积极的政治态度都影响着韩愈。

在兄长离世后，兄嫂郑氏接任扛起一家之重担，继续抚养韩愈，让其能继续读书学文。她对韩愈“念寒而衣，念饥而飧；疾疹水火，无灾及身”¹⁵，韩愈心怀感激，说道：“在死而生，实维嫂恩”¹⁶。他后来取得的种种成就，离不开其兄嫂之无私奉献。她教育韩愈，不辍学业，并按照韩氏世代承继不绝的家风，将韩愈送入“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¹⁷ 韩愈在兄嫂的督促下精进学业，饱读诗书，学习古人之道。韩愈《复志赋》里曾回忆到：“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兮，超孤举而幽寻”¹⁸可见其钻研古人之言和古人典籍之举，这可谓是他后来“复古”思想之理论基础。

¹⁴[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卷224，页7213。

¹⁵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09。

¹⁶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09。

¹⁷ 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49。

¹⁸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81。

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主要仕于德宗、宪宗、穆宗三朝。韩愈的家庭背景对其政治追求有一定的影响。对中晚唐士人来说，治国安邦、为吏理民是第一位的。¹⁹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国力衰退，社会满目疮痍，动荡不安，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还。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²⁰韩愈亦是如此，他积极求仕，对政治有其理想与抱负，欲通过自身的努力辅佐朝廷以达到中兴。他曾云：“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洟澜”²¹可见其对政治的远大抱负和立志报国之思想。

另外，其早年颠沛流离的贫苦生活也是促使其寻求仕途之缘由。因兄长早逝，家庭失去支柱，生活条件困顿，在兄嫂的坚持和侄子的牺牲下韩愈才得以继续读书。《答崔立之书》中讲述了其求仕心态：“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²²韩愈因“苦家贫，衣食不足”到了长安，看见进士及第者受到人们的看重，韩愈心生向往。考取进士不仅能获他人敬重，更能直接地改善家庭之窘境，故他始求为官之道。

综上所述，韩愈求仕思想之形成可说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其家庭背景、时代风貌、现实因素等原因。他入仕为官的愿望不仅是对自身理想的追求，同时也包含现实因素，望以此改善生活之困顿。因此，这两点在其干谒书信均有体现，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故此处不赘述。

¹⁹ 贺叶平，《中晚唐干谒散文研究》（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40。

²⁰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页386。

²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67-68。

²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62。

第二节 韩愈仕途经历与干谒书信创作

《旧唐书·韩愈传》载：“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²³其中的“投文于公卿间”说明了韩愈干谒之行为，并简略概述了韩愈早年考进士之经历。实际上，韩愈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唐代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发展到中唐，明经和进士两科是最受当时朝野所重视的。《新唐书·选举志》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²⁴，说明了当时进士应试者人数之多和看重登第进士者的社会风气。韩愈亦受此风之影响，决定通过进士考试及第而入仕。

然而，在科举考试不“糊名”的情况下，士子能否登第，并不完全决定于试卷的优劣，主要是取决于达官和其他名人向主司推荐。²⁵《旧唐书·刘太真传》曾载：“掌贡举，宰执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²⁶说明了受达官显贵所推荐的考生将获优先录用的情形。韩愈初试进士科之时并不了解当中之玄机，所以不获推荐，在贞元三年（787）和贞元五年（789）的进士放榜日时皆榜上无名。贞元六年（790），韩愈作《上贾滑州书》求助于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贾耽，以冀获其举荐。韩愈此举谓之“行卷”，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云：

²³[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卷160，页2857。

²⁴[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卷44，页765。

²⁵ 邓谭洲，《韩愈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页49。

²⁶[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137，页2559。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²⁷

韩愈当时的应试身份与《上贾滑州书》文中“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贄”²⁸执贄干谒的举动皆符合上述说法，属于行卷行为。此篇为韩愈首篇干谒书信，可惜未获他所求之理想音讯。贾耽经明经及第而入仕，其性格严谨而“不喜臧否人物”²⁹，所以未理会韩愈之干进。

韩愈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与陆复礼、李观、崔群等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试，因上作手脚，韩愈落第。³⁰贞元九年（793）和十年（794）又应博学宏辞科，皆不中。唐代进士及第后未算是正式进入仕途，及第者需再参与吏部试，通过博学宏辞科试才能被授予官职。韩愈进士登第后三试吏部皆不中，未能如愿进入仕途。在此期间，韩愈作了《上考功崔虞部书》、《应科目时与人书》、《与凤翔邢尚书书》、《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书》、《后廿九日复上书》等六篇干谒书信，以求获举荐顺利当官。直至贞元十二年（796），韩愈获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毫颍观察使董晋次子董溪的推举，任观察推官，终获官职进入仕途。

除了白身举子，在职官员也有执贄干谒的行为，前者是为了尽快获得出身，后者是为了得好官，顺利升迁。³¹韩愈后期的干谒书信便属于后者。贞元十八至

²⁷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3。

²⁸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48。

²⁹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66，页3950。

³⁰ 张清华，《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页56-57。

³¹ 王仝，《唐代干谒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78-79。

十九年间（802-803）他任国子四门博士期间写了《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上李尚书书》等干谒书信以求提拔引进。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获御史中丞李汶举荐，任监察御史，十二月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触怒德宗，被贬阳山县令。顺宗永贞元年（805）大赦，韩愈移江陵法曹参军，写《上兵部李侍郎书》以求推援赏识。

综上所述，韩愈 11 篇干谒书信可根据其当时的身份分为前后二期。前期干谒书信是以应试者身份进行行卷，以求获举荐顺利进入仕途；后期干谒书信则是以在职官员的身份希望获得推荐赏识，以得好官职与升迁。

第三章 韩愈干谒书信之自我书写

书信中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它总是具有一定目的和为了某一需要而写，而且是希望在思想情感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³²干谒书信属于“为了某一需要而写”的应用文文体。信中的自我书写篇幅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自身能力、才学不得赏识之困苦境遇等自身情况，以让干谒对象对自身形象有大致的轮廓。自我书写的最终目标亦是希望能获干谒对象的举荐与赏识，从而达到求仕之核心目的。求仕者在文中对自身正面、负面形象的建构之考虑与取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干谒文中身卑质朽的自我

³²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页 400。

形象，乃被压迫自身之举，未必是作者内心对自己的真正认同与定位。³³形象背后未言之深意，求仕者欲言之肺腑之言，在干谒书信中如何体现？本章节将针对韩愈 11 篇干谒文中的自我书写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的自我形象建构，试回答以上所列之问题。本章节将分为“复古求奇”和“人微贫苦”两种形象来进行论述。

第一节 复古求奇

韩愈干谒书信内可见他复古求奇之形象。复古求奇之形象可分为“复古”与“求奇”两个方面来看。后者是韩愈想要达到的效果，前者则是达到效果的手段。如《上贾滑州书》体现了韩愈复古的形象：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干进。又惟古执贄之礼，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于此……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³⁴

韩愈开篇先点明自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以古代的执贄之礼以事干谒。“执贄”是一种礼节，“贄”就是谒见之资。³⁵韩愈以其旧时所作的十五篇文为贄，以达其干谒之意图。另外，韩愈所言所行不敢违背古人之传统，亦是其复古的体现。

³³ 张鑫诚，〈不遇与自鬻：论初盛唐干谒文中的自我书写〉，《奇莱论衡：东华文哲研究集刊》2021 年第 9 期，页 31。

³⁴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48。

³⁵ 王仝，《唐代干谒与文学》，页 76。

这两点皆体现韩愈的尚古思想。这除了是受其成长和学习经历影响，亦是受时代和社会风气所致。儒家学说中的阶级观念与伦理道德观念是统治阶层用以巩固权力的工具，所以儒家学说从历代以来被视作正统思想，这也是韩愈认为的“古”。这里将“古人”作为人言行的普遍规范来把握，正因为那也是作为统治阶级一员所应具备的规范。³⁶韩愈选择以“复古”形象呈现，可谓是出自求官之考量，因他认为拥有“古”之特质是进入仕途的条件。如他在贞元十三年（797）《复志赋》所云：

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窥前灵之逸迹兮，超孤举而幽寻。既识路又疾驱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阅时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拾。”³⁷

韩愈回忆其早年间的学习经历，说明其勤奋学习古人之文章、思想、品德的经历。“青紫”指卿大夫之服装。他叙述其少时所想，认为学作古文则“谓青紫其可拾”，可见其韩愈认为学习古文与入朝当官是有关联的。因此，他选择重点凸出其复古之形象于干谒对象。

然而，他于信中亦提及自身“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之处境，从这表述可推断，尚古或是造成他“周流四方”的缘由，并带有习古之举不被时人所重之含义。这亦在贞元九年（793）《上考功崔虞部书》中有所体现。韩愈以“愈不肖，行能诚无可取，行已颇僻，与时俗异态，抱愚守迷，固不识仕

³⁶ 川合康三著、刘维治、张剑、蒋寅译，《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143。

³⁷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81。

进之门”³⁸开篇，表明自身的行事风格与时俗格格不入，这导致其未能进入仕途。

“与时俗异态”体现他于当时众人而言是“奇”之存在。此信为韩愈二应吏部试不第时所作，他在文中叙述了应考经历，表示自身原已被提拔，但因“华实不兼”只注重个人内在之品德才能，却忽视了时俗之喜好，而被主事黜落。这体现了韩愈的“复古”思想与时俗是处于对立面的，不被时人理解与接受。

上述二文皆体现韩愈的复古求奇思想于当时皆被排斥。然而，从其他的干谒书信可见对于他的复古求奇思想相对正面的论述。如贞元十一年（795）《上宰相书》：

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谤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³⁹

韩愈重点叙述自身文章与“古”之联系，他的文章都是依照六经之旨所作，并在其中辨析时俗之所惑。虽然文中使用之文辞偶会出现“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但整体并不会违背教化。李肇《唐国史补》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⁴⁰“古”与“奇”也都是韩愈文章之特色。《答李秀才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⁴¹体现了韩愈的复古思想，以古人的道为自身之志向，并将古人之道用于文章内。此外，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认为应向古

³⁸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80。

³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39。

⁴⁰ [唐]李肇撰、聂清凤校注，《唐国史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卷下，页268。

⁴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527。

人学写文章，但须“师其意不师其辞”⁴²，前者是“复古”，后者是“奇”之创造。由此可见，韩愈主张复古，学习古人文章中所体现的道之思想，而非古人之文辞。他主张文章的文辞应创新，这也导致其文有“奇”之效果，异于众人，符合其干谒书信中“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之说法。此外，“以求知于天下”的论述可做两种解读，一是韩愈希望其文章能知名天下，二是希望通过“奇怪之辞”的特异形象让他人知其存在。无论哪一种，皆体现韩愈有意地塑造自身“古”与“奇”之形象。

另外，永贞元年（805）《上兵部李侍郎书》中亦可见他对于自身文学造诣的叙述：

“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砢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凡自唐虞已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河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玕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通达。”⁴³

虽是称赞自己的文学造诣，才学渊博，但句里行间不见傲慢之态，皆是谦卑地徐徐道来。他的卑恭是对自身身份的自知和言语尺度的把控，也不像轻狂文人那般恃才傲物，而是在卑恭中又显露出读书多年的自信风骨。⁴⁴此篇是后期的干谒书信，韩愈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官场沉浮，误言被贬，与前期相比多了些沉着通达。韩愈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表现其“复古”形象。他先说明其穷究古籍

⁴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2050。

⁴³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652。

⁴⁴ 谭科，《韩愈书信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页 25。

之缘由，因不知如何讲述自身的“困厄悲愁”，所以通过深入研究儒家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反复思考体会文章中的精义及语句。同时，不断增进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学业，以用儒家的道统和文统来创作文章，这一点体现了韩愈复古之形象。通过这样的学习，成就了自身无所不通达的奇奥文辞。“奇辞奥旨”则指韩愈文章之“奇”特点，从文章之“奇”衍生至作文章者之“奇”，以此呈现出个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从《旧唐书·韩愈传》“愈所为文，务反进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⁴⁵和《新唐书·韩愈传》“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⁴⁶的记载中亦可见韩愈文章中的“奇”之特色。此外，此信亦可见韩愈通过夸饰自身之才与道德修养来达到“奇”之特色，让自身有别于众人的特异形象，给干谒对象认为此人“才高眼阔，也非凡夫俗子”⁴⁷的印象。

上述二文皆从文学的角度谈“古”和“奇”之形象，韩愈通过“复古”学习古人之道，并在文章创作中通过辞藻的创新达到“奇”之效果。相较于先前的干谒二文称自身因行为效仿古人，而不被社会接受，此二篇对于自身“复古”的形象所带来的影响的叙述相对正面，不见他因复古的形象而不被时代所接纳，不被众人认同的处境之描写。相反，韩愈在干谒书信中所塑造的“复古”形象，起到凸显自身“奇”之形象的效果。韩愈为何而“求奇”？拥有异于常人的奇怪特点之人通常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此外，拥有超越常人之才能之人亦可称之为“奇”。韩愈可谓是出于这两个目的而“求奇”。干谒时宣扬自我的“古”与“奇”，是作为正面价值的策略。⁴⁸通过“奇”之特色，不仅凸显

⁴⁵ [后晋] 刘昫，《旧唐书》，卷 160，页 2863。

⁴⁶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176，页 4075。

⁴⁷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页 204。

⁴⁸ 游胜辉，〈论韩愈干谒文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彰化师大国文学志》2018 年第 36 期，页 76。

自身高于常人之奇才，同时亦让干谒对象能对自身有深刻之印象，增加成功被举荐的概率。

第二节 人微贫苦

干谒书信具有自成一套的结构和写作模式。王伧《唐代干谒与文学》将其分为：赞美恭维——自伤沦落或自视甚高——申明意图。⁴⁹本小节所讨论的人微贫苦之形象属于“自伤沦落”一类。韩愈干谒书信中可见其对自身经历与困苦生活的描述。韩愈的《上考功崔虞部书》中便有相关内容。此篇是韩愈于贞元八年（792）通过博学宏辞科试，后在复试中被中书省所黜的背景下，于次年上书向考官表明心迹之作。他在其中写道：“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粢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⁵⁰直白地讲述自己现今所面对贫困窘迫的生存问题。他不仅没有足够租赁房子和雇佣僮仆的钱财，同时也面对衣服与粮食断供的困境。

另外，韩愈贞元十年（794）《与凤翔邢尚书书》以布衣之士和王公大人应“相须相资”互相成就的论点开篇，用以说明干谒行为的合理性。此篇为其第四篇干谒书信，前三篇开篇的重点皆落在其复古求奇和才能不凡的形象，而此篇则以“布衣之士身居穷约”⁵¹的形象开篇。韩愈当时的应试者身份符合“布衣之士”的说法，因此此句可谓是其真实写照。这个转变亦反映他现实生活的困苦程度，促使其作此安排。贞元十一年（795）《上宰相书》“四举于礼部乃一得，

⁴⁹ 王伧，《唐代干谒与文学》，页109。

⁵⁰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81。

⁵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91。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⁵²、“恶衣食，穷体肤”⁵³韩愈将自身在科举屡试不中，四试进士科仅获一得，三试吏部博学宏辞科皆无一得的应考经历，与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之困境和忧虑面貌清楚展现。他将坎坷的应试经历结合生活困顿一同表现于文中，凸显其人微贫苦的形象，望以此获达官怜惜举荐。

韩愈后期干谒之书信亦能见其生活之困顿的表述。如：《与于襄阳书》“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⁵⁴表示只要达官的一顿餐食费便能解决自身粮食与佣人的花费；《与陈给事书》“贫贱也，衣食于奔走”⁵⁵说明其为衣食温饱而四处奔忙而未能与陈给事相见；《上兵部李侍郎书》“家贫不足以自活”⁵⁶讲述其早年寻官职之缘由。以上书信皆塑造了人微贫苦的形象，这不仅是干谒者真实处境之投射，同时亦是干谒者为增加被举荐的技巧手段。干谒文的说服技巧中有一类为将赞许颂扬对方和有意压抑自我、倾述个人之困厄失意相结合，二者一先一后、一扬一抑、互相结合，产生裨阖游说之效果。⁵⁷韩愈在干谒书信中赞颂吹捧干谒对象，并展现自身之穷困处境，后再申明求荐意图，通过二者巨大的反差，使对方心生不舍、惜才之情，以此达到游说求荐的目的。

韩愈在干谒书信对自身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如实展现之举亦惹来非议。如司马光曾评：

⁵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239。

⁵³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241。

⁵⁴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523。

⁵⁵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576。

⁵⁶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652。

⁵⁷ 王仝，《唐代干谒与文学》，页 178。

观其文，知其志，其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此，彼又乌知颜子之所为哉！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士贫贱然后见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难，故孔子称之，而韩子以为细事，韩子能之乎？”⁵⁸

韩愈在文中提及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之举被认为其是爱慕荣利，汲求富贵者，被司马光所诟病。自古以来，对于“功利”和“非功利”的讨论，前者相较后者常被抱以批评之态。若以“功利”的视角来看韩愈此举，其实只是作为失意者对于其生活的实际考量。此外，求仕之举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其衍生出的干谒书信自然亦带有功利的性质。另外，此行为亦对干谒的效果有正面的帮助。干谒者将窘迫的生活状态真实地反映在干谒书信中，一则可以表达他们求仕的迫切之情，二则突出贫困中苦学上进的志向，易引起在上位者的同情。⁵⁹因此，此举可说是求仕者深谋远虑之策略，亦是人之常情，是对生活基本需求和保障的追求，不应被加以批判。

第四章 韩愈干谒书信之心态变化

⁵⁸ 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页1401。

⁵⁹ 王凤玲，《唐代书信研究——以干谒、论文、论史书信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页48。

干谒书信因对受书对象有所求，所以其中的文辞、作者形象不免带有卑微的观感。韩愈和多数文人干谒时的心情一样，内心比较矛盾，写信给长辈或者高官希望得到引荐，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但又需要放下自尊和自信，并且表现出不卑微的姿态。⁶⁰这一点于韩愈早期的干谒书信多有体现，可见其对于干谒一事的挣扎与妥协。本章节将在上一章节的基础上，结合历代评语，进一步对比韩愈书信中对自我形象之描写与建构，以察其相近或差异处。接着，分析韩愈对于干谒行为之定位，并结合他其他作品中所表述的思想进行对比，以此来探讨韩愈干谒书信中的心态变化。

第一节 自我形象之对比

本小节将分为三方面对比韩愈书信中的自我书写：一是同一书信形象之对比；二是不同书信形象之对比；三则是书信与其他作品形象之对比。

首先是同一书信形象之对比。从韩愈同一书信中所建构的形象来看，他是否进行干谒一事是经历过挣扎的，而且有些时候书信中的形象与其自身实际之行动是有出入的。贞元九年（793）《上考功崔虞部书》“欲事干谒，则患不能小书，困于投刺；”⁶¹、“虽欲从之，末由也已。”⁶²韩愈称自己欲事干谒，但苦于无法投递名帖和没有方法可遵循。果真如此吗？干谒在初盛唐之际已是社会普遍现象，士子干谒的例子多不胜数。如初唐的王勃有《上刘右相书》，盛唐的李白亦有《与韩荆州书》的干谒书信，到了中唐，应有许多前人的干谒经验可遵

⁶⁰ 李娟，《韩愈书启文研究》（太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页9。

⁶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81。

⁶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181。

循。这样的表述方式应只是韩愈的说辞，意在向干谒对象澄清非自己不事干谒，而是其他因素所致。然而，信中的“欲学为佞，则患言讷词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终日”⁶³可见韩愈不愿干谒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干谒是以巧言令色谀媚于人，也担心干谒不成而变成小人那般卑微下贱之貌，透露出他内心认为干谒这种求人之举是上不得台面的想法。由此可见，韩愈出于现实考量欲事干谒，却又放不下自尊心和觉得难为情的内心矛盾。虽然如此，文末他仍以恭敬之态请求官员赏识，这与前文叙述称不愿卑躬屈膝事干谒的说法是有出入的。

另外，贞元十年（794）《应科目时与人书》“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俛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⁶⁴韩愈表明对在上位者俯首帖耳，卑微求助或施舍的行为，不是自身的志向。若真要委屈自身行如此行径，他宁愿“烂死于沙泥”，自得其乐。由此可见，他对干谒行为是抗拒的。然而，他却在文末希望“阁下其亦憐察之”⁶⁵，其中的“憐察”可见其低声下气之态，这行为与先前不愿“摇尾而乞怜者”的形象是有出入的。

接着是不同书信形象之对比。对比不同时期的干谒书信，可见韩愈对干谒行为的态度转变。以上述两篇文章为例，《上考功崔虞部书》“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大夫士之口”⁶⁶说明了韩愈在此之前于京中应试之时日从不事干谒。因现实之故，他唯有随波从俗，写了此篇以事干谒，望获举荐。虽其写此书干谒达官，然而文中末尾的“是以进其说如此，庶执事察之

⁶³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1。

⁶⁴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8。

⁶⁵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9。

⁶⁶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1。

也”⁶⁷虽有求于人，但不见低声苦求于人之态，只是有礼体面地望获干谒对象的赏识。正如林云铭《韩文起》卷三云：“语语悲中带壮，并无片言求援”⁶⁸韩愈此时只将个人之独特、才学、困境通过文章展现于干谒对象，但未见卑微祈求的形象。到了《应科目时与人书》，韩愈一改体面请求之形象，“阁下其亦憐察之”⁶⁹一句尽显卑微之态。此时正是韩愈应吏部试却屡屡不中之时，或是自身对仕途之执念，抑或是见他人因干谒而平步青云的影响，使其格外心急，迫切想被赏识，故言语亦体现殷切之态。

另外是书信与其他作品形象之对比。同样以《应科目时与人书》此篇为例，将此篇与其他作品形象进行对比可发现，其中的形象建构有相似之处。《应科目时与人书》“天池之滨，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彙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⁷⁰韩愈在此篇中以“怪物”自喻，并着重说明其与“常鳞凡介”是不同的。该“怪物”若处于适合的地方，获得“有力者”的帮助便能大放异彩，韩愈以此自喻自身之处境，背后蕴含着其迫切想获得赏识举荐之情。这个用以自喻的怪物形象于韩愈其他作品中亦可见相似的形象。如《获麟解》中“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⁷¹的麟之形象。本是象征祥瑞的麟，却因没被圣人认出而被当作不祥的麟，这与怪物的处境有异曲同工之处。两篇文章皆体现了韩愈怀才不遇，等不到懂得赏识和提携他的“有力者”或“圣人”的处境。因《应科目时

⁶⁷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2。

⁶⁸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页 103。

⁶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9。

⁷⁰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8。

⁷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440。

与人书》带有干谒的目的，所以相较于《获麟解》，文中对于怪物不凡形象的描写更加细腻，亦将怪物希望获得重用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如：

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⁷²

怪物努力向有力者争取和表现，但却被忽视，这体现了他在这之前的两篇干谒书信不得回响的现状。“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说明了怪物不向命运低头的进取精神，这亦表明了韩愈对于求仕的决心。正如曾国藩评此篇云：“其意态诙诡瑰玮，盖本诸《滑稽传》。干泽文字如是，乃为轩昂，他篇皆不能自振。”⁷³

第二节 干谒行为之定位

干谒与士人对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追求是矛盾的。⁷⁴无论是干谒以求举荐、官职、钱财，这些皆被视为功名富贵之物，这些与文人、士子应清高、拥有超越世俗的独立人格的风气格格不入，所以干谒行为常被贬低批判。韩愈原先亦对干谒之举持排斥之心态，随后其心态有所转变。他对于干谒行为的意义有其见解，并在干谒书信中申明其干谒诉求前加以论述，以此论证干谒的合理性，亦

⁷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188-1189。

⁷³ [清] 曾国藩著，《曾国藩全集·读书录（第一五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页 323。

⁷⁴ 贺叶平，《中晚唐干谒散文研究》，页 40。

不让他的干谒行为显得低下卑微。此小节将结合韩愈其他作品中对干谒的看法来论述他对于干谒行为的定位。

除了上述提及的《上考功崔虞部书》与《应科目时与人书》，韩愈的其他诗文亦表述了其对于干谒行为的不认可。如韩愈《复志赋》中提及：

“惟名利之都府兮，羌众人之所驰。竞乘时而附势兮，纷变化其难推。

全纯愚以靖处兮，将与彼而异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顾初心而自非。”⁷⁵

韩愈通过描写自身与众人的不同选择，进而凸出了两者之别。众人向往名利，所以选择为名利奔走，“乘时而附势”；韩愈不愿自己的初心磨灭在名利场中，故选择充实自身的才学，不为权贵而奔走。干谒行为亦是其中一种为权贵而奔走的形式。由此可见，韩愈对于干谒行为持排斥心态。

后来，韩愈对于干谒行为的心态有所转变，可见他在其他书信篇章中如《与凤翔邢尚书书》、《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等都极力论证干谒行为的合理性。《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提及：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⁷⁶

⁷⁵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82。

⁷⁶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40。

韩愈举布衣之士与王公大人为例，以二者之间互利的关系来说明干谒者和干谒对象双方互助互利的关系。他认为穷迫的布衣之士需要借着王公大人的举荐以成就自身当官为国之志；而王公大人需要借助布衣之士之赞誉来提高自身声誉。因此，布衣之士不必因自身身份卑贱而巴结奉承，王公大人亦不应因身份尊贵而高傲骄贵。这个论述使得原本地位低下者向在上位者求助以获举荐的单向干谒行为，变成双方皆经历施与受过程，双向得利的行为，而非干谒者一方的苦苦哀求。他将二者置于平等地位，认为他们是相互借重，互相依赖的关系。此说法使得自身有求于人的干谒行为显得不那么卑微。这与《与于襄阳书》的观点是一致的：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⁷⁷

韩愈以先达之士和后进之士的关系说明二者互助互利的关系，这与上方《与凤翔邢尚书书》所述的布衣之士和王公大人二者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二文皆论述干谒行为之合法性，说明干谒者和干谒对象应上下相须，但后文进一步提及二者难相遇之缘由。他认为这是因为“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⁷⁸韩愈预先指出可能造成干谒失败的原因，委婉地提醒干谒对象，不做出文中所述的过失之举，以此来提高干谒的成功率。

⁷⁷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522。

⁷⁸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 1522。

另外，《上宰相书》亦有与上下相须相似之论述：

然则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为心，
则上之道不必难其下，下之道不必难其上。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
也；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⁷⁹

韩愈将在上位者和干谒者放到平等的位置，他认为在上位者需要人才来治理天下，而干谒者也需要名位来实现济世之理想，两者所求是一致的。如心之所求是一致的，那么两者都应互相成全，不要互相刁难。韩愈的干谒文虽然也脱不了诉苦哀求的俗套，却在诉苦哀求的同时提出一套人才进用的理论来，使他的要求愈发显得合情合理，甚至说得上义正词严。⁸⁰

然而，韩愈后来回忆其前期的干谒行为，却是抱有羞愧之态的。贞元十五年（799）《与李翱书》提及：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
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今年加长矣，复
驱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难矣。⁸¹

韩愈回忆起早期于京中应考时为了生活温饱四处求人干谒行为，表示不知如何面对这段往事，并表示若现今让他再进行干谒，他对此感到非常为难。由此可

⁷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240。

⁸⁰ 阎琦、周敏，《韩昌黎文学传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页311。

⁸¹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1387。

见，韩愈先前对于干谒行为合理性的议论并没有彻底说服、改变自身对干谒的看法，只是对当时所处之困境的一种应对之策。虽然韩愈表示不愿再事干谒，但他在贞元十八年（802）又写了《与于襄阳书》事干谒，并再次提出上下相须的想法，此举的思想上方已论述，此处不再复述。接着，韩愈还写了《与陈给事书》、《上李尚书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等干谒书信以求提拔升迁。此时韩愈对于干谒的态度再次从不认同转向认同。

另外，韩愈对于干谒的认同，不仅是自身事干谒，亦推己及人鼓励后生行干谒以安身立命。如元和三年（808）《赠唐衢》中云：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

当今天子急贤良，匭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

82

唐衢与韩愈有相似之经历，他同样应考进士，久考却未能及第。唐衢“能为歌诗，意多感发”⁸²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同时也富有情感，读他人之文章时常被内容里所蕴含的情感所触动而悄然泪下。韩愈称唐衢“独抱奇材”，可见是认同唐衢之才学的。适逢唐宪宗下诏于御宣政殿亲试制科举人，韩愈因其二人相似的应考经历，加上对人才之重视，建议唐衢“上书自荐”事干谒。他希望唐衢能被提拔，发挥其良能。由此可见，韩愈此时认同干谒之功能，他劝人干谒的行为是出自惜才，亦体现了其对提拔人才的重视。当他满怀热情地鼓励后进晚生、

⁸²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页460。

⁸³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0，页2863。

努力事干谒的时候，便明显流露出唐代文人共同向往的战国士人那种张扬自我、毛遂自荐、恃才自负、平交王侯的人生理想，韩愈此举可谓是其自身精神气质的人格理想的一种折射。⁸⁴

综上所述，韩愈对干谒的看法经历了两次从不认同转向认同。若要求仕当官，干谒是过程中重要的一项。如韩愈一直保持先前对干谒的排斥态度，那其将面对无解之困境。因四处碰壁的应考求仕经历，加上基本生存之考量，韩愈尔后改变了对干谒行为的心态。他接受现实，开始干谒并提出一套自身对于干谒行为的看法。他认为干谒行为是合理的，因在上位者与干谒者所求皆是一致的。林云铭《韩文起》评“但丐贷之言，最易涉于猥鄙。是书以先达后进相资为用二意平提，占却许多地步”⁸⁵韩愈将上位者与干谒者置于平等地位，二者相互依赖，互相成就，使干谒行为合理化，不被批评为似乞求。这个转变可说是出于现实之考量，非韩愈对干谒行为本质的接受，这也能解释为何他在贞元十五年（799）《与李翱书》中表明不愿如早前四处求人干谒之举，却又于贞元十八年（802）写了《与于襄阳书》与之后多封书信事干谒。后来，许是脱离了干谒者的身份，抑或是对人才之重视，韩愈在元和三年（808）鼓励唐衢进行干谒以求官。韩愈不仅要自己作官行道，而且还要更多的人作官行道，希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⁸⁶此时的韩愈可说是坦然接受了干谒行为，不仅自行干谒，亦希望后生行干谒。

⁸⁴ 王伧，《唐代干谒与文学》，页 76。

⁸⁵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页 126。

⁸⁶ 郭预衡，〈简说唐代文章之变迁〉，《文学遗产》1988 年第 4 期，页 52。

第五章 结语

综上所述，受科举制度影响，唐代盛行干谒之风，干谒书信数量大幅增加。因时代背景影响，中晚唐士人普遍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期待入朝当官为国家做贡献，以期王朝中兴。韩愈求仕思想之形成可说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其家庭背景、时代风貌、现实因素等原因。他出自官宦世家，受父亲和兄长之影响继承家风。因父母、兄长早亡，生活之困顿亦促使其选择进入仕途。他入仕为官的愿望不仅是对自身理想的追求，同时也包含现实因素，望获基本的生活保障。韩愈的 11 篇干谒书信可根据其创作时的身份分为前后二期。前期干谒书信是以应试者身份进行行卷，以求获举荐顺利进入仕途；后期干谒书信则是以在职官员的身份希望获得推荐赏识，以得好官职与升迁。

干谒书信属于应用文文体，当中的自我叙述的内容可谓是文章重点，因为这是在上位者了解干谒者，并决定是否同意举荐的依据。韩愈在干谒书信中以“复古求奇”和“人微贫苦”进行自我描写，真实地展现了其现况，以求能让干谒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韩愈选择在信中塑造“复古”形象，因他认为拥有“古”之特质是进入仕途的条件。“古”也衍生至“奇”。他的复古思想与时俗格格不入，这也造就成其独特性，于当时众人里他是“奇”之存在。另外，他主张文章的文辞应创新，这也导致其文亦有“奇”之效果。文中复古求奇的形象不仅能体现干谒者高于常人之奇才，亦能让干谒对象加深印象，增加被举荐的机率。另外，韩愈也在干谒书信内描写人微贫苦的形象，同时这也是其真实困境。他在信中赞颂吹捧干谒对象，并展现自身之穷困处境，后再申明求荐意图，通过二者巨大的反差，使对方心生不舍、惜才之情，以此达到游说求荐

的目的。此举也多遭批评，认为韩愈爱慕荣利，汲求富贵者。然而，干谒本身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其衍生出的干谒书信自然亦带有功利的性质，且渴望生活温饱无疑是人之常情。此举亦对干谒的效果有正面的帮助，可说是干谒者之策略，不应加以批判。

接着，通过对比韩愈干谒书信与其他作品的形象建构发现，他对干谒行为的想法是有改变的。从一开始的不认可干谒，对此求人之举感到羞愧，但因现实考量，他开始接受，屡屡在文中讲述干谒之合理性，以此来显得干谒的行为不那么卑微。韩愈认为干谒者和干谒对象是相互借重，互相依赖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尔后韩愈对干谒的看法再次发生改变，表示对先前的干谒行为表示羞愧，且不愿再干谒。然而，因现实所需，三年后韩愈再次事干谒，且在信中表达干谒行为的合理性，此时他对干谒的态度转向认同。最后，韩愈甚至鼓励与其求仕经历相近、有才学的后生唐衢行干谒以求得官职，使才华得以施展。他此时是认同干谒之功能，劝人干谒的行为是出自惜才，亦体现他重视人才培养的观念。

对于韩愈干谒书信的课题研究仍有可探讨的空间，如：“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之关系、“求奇”之思想与其文学观之关联、韩愈干谒书信与代言干谒书信的思想差异等课题。未来的研究可采用“文史互证”之研究方法，将韩愈干谒作品的历史背景与韩愈事迹进行联接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历代评语之准确性，对韩愈干谒书信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研究。

引用书目

专书

1. 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陈飞，《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4.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 邓谭洲，《韩愈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6.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7.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9.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11. 王仝，《唐代干谒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阎琦、周敏，《韩昌黎文学传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13. 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5. 张清华，《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16.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专书（古籍）

1. [汉] 司马迁撰、[宋] 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南朝梁]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唐] 李肇撰、聂清风校注，《唐国史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5. [宋] 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6. [宋] 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宋]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清] 曾国藩著，《曾国藩全集·读书录（第一五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

译著

1. 川合康三著、刘维治、张剑、蒋寅译，《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期刊论文

1. 郭预衡,〈简说唐代文章之变迁〉,《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页42-57。
2. 游胜辉,〈论韩愈干谒文中的自我形象塑造〉,《彰化师大国文学志》2018年第36期,页65-94。
3. 张鑫诚,〈不遇与自鬻:论初盛唐干谒文中的自我书写〉,《奇莱论衡:东华文哲研究集刊》2021年第9期,页23-52。

学位论文

1. 贺叶平,《中晚唐干谒散文研究》,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2. 李娟,《韩愈书启文研究》,太原: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
3. 谭科,《韩愈书信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4. 王凤玲,《唐代书信研究——以干谒、论文、论史书信为中心》,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附录

序	创作年份	干谒书信	分期	干谒对象
1	贞元六年 (790)	上贾滑州书	前期	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郑滑等州观察使贾耽
2	贞元九年 (793)	上考功崔虞部书	前期	吏部宏词官崔元翰
3	贞元十年 (794)	应科目时与人书	前期	韦舍人（不详）
4	贞元十年 (794)	与凤翔邢尚书书	前期	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州观察使，加检校工部尚书邢君牙
5	贞元十一年 (795)	上宰相书	前期	宰相赵憬、贾耽、卢迈
6	贞元十一年 (795)	后十九日复上书	前期	宰相赵憬、贾耽、卢迈
7	贞元十一年 (795)	后廿九日复上书	前期	宰相赵憬、贾耽、卢迈
8	贞元十八年 (802)	与于襄阳书	后期	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颀

9	贞元十九年 (803)	与陈给事书	后期	给事中陈京
10	贞元十九年 (803)	上李尚书书	后期	京兆尹李实
11	顺宗永贞元年 (805)	上兵部李侍郎书	后期	兵部侍郎李巽

附录一、韩愈干谒书信列表⁸⁷

⁸⁷ 资料来源：张清华《韩学研究（下册）》，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